

宁夏古代最大的湖泊——千金陂(上)

银川平原的唐徕渠以西,南起青铜峡市邵岗堡,北至贺兰县暖泉,在东西宽六七公里南北长约70公里范围内,清代还存有数十个湖泊。19世纪至20世纪,不断开挖排水沟,排水造田,加之近50年来城市扩展,填湖搞建设,使这些湖泊十去八九,但从今天的地图上看,这一线仍是湖泊密布。例如:阅海公园原名西湖(包括小西湖),是历史遗留的一片珍贵湿地。它占地1.2万多亩,水域广阔,风景秀美,是闻名全国的国家级湿地公园。公园内有各种植物114种、鸟类107种,其中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0余种,是我国西部地区鸟类迁徙的中转站之一。2004年新建的人工水道典农河,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湖泊湿地是“地球之肾”。为了探索银川平原的湖泊湿地变迁,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生存环境,特对唐代的千金陂及其演变、成因,作一粗略考证。

唐代的万顷碧波:千金大陂

唐人李吉甫的地理名著《元和郡县图志》,在灵州所属灵武县下,有这样两段记载:

“黄河自回乐县界流入。千金陂,在县北四十二里。长五十里,阔十里。”“汉渠……从汉渠北流始为千金大陂……”两段文字皆列在唐灵武县水系中。《辞海》解作水池或圩岸。显然,千金陂是一个很大的长方形水域,其水岸与一般的湖泊不同,不是缓坡而是立岸,故又称“千金大陂”。唐代的“里”,比今天的华里略大,其差异可忽略不计。也就是说,千金陂长25公里,宽5公里。水面约125平方公里,合计18.75万亩。

这是史籍记载的银川平原最大的湖泊。本人在《宁夏历史地理考》中已作考证,唐灵武县治今青

铜峡市邵岗镇附近。因此,千金大陂有两点是清楚的:第一,它位于银川平原的西部;第二,它是一个由南向北、比较规则的长形水域。其具体位置在哪里,《元和郡县图志》的“在(灵武)县北四十二里”,说的是一个点。到底是长湖的南面端点,还是长湖的中点?北端?由于这两点无法肯定,所以,看到这条史料已有30多年,却不敢轻易确定其具体位置。

《元和郡县图志》在怀远县末还有一段重要记载:“新堡,在(怀远县)西北四十里,永昌元年置。堡内安置防御军二千五百人,粮五万石。旧名千金堡,今名新堡。”“永昌”是武则天当政年号,只有一年,即公元689年。前两年重温此书,看到这里,脑中突然一亮:既然“旧名千金堡”,千金陂必然在其侧。这就是说,千金陂

的北段,至少到了新堡。而新堡即在怀远县西北四十里,其位置可考定在今银川市西湖的西面。由此向正南25公里,大致是今永宁县望洪镇西北的靖益村。从这里向南再20公里,即为青铜峡市邵岗镇。

这样一梳理,即可认定:《元和郡县图志》“在(灵武)县北四十二里”,说的是千金陂的南端,大约在永宁县西靖益堡。它南北长25公里,其北端就到了今银川市西夏区最北的丰登。其走向,与今天的艾依河相近,只不过要宽得多。

后世的湖泊遗存:连湖数十里

1960年的宁夏,银川城周边小湖无数,尚有1平方公里以上的大湖几十个。这些大湖的分布,主要是南北走向的两个带:一是唐徕渠以西的狭长地带,宽5至8公里内,有

连湖数十里;二是惠农渠西岸到汉延渠间的狭长地带,分布宽约8公里。“两带”相比,前者湖泊更多、更大。如银川市的唐徕渠以西到新城之间,到处都是湖泊湿地。当时还没有北京中路,从老城去新城,只能由西门桥走今天的黄河路(当时叫银新路),过了三一支沟约1公里,再向北约1公里,继折向西到新城。这条路的两侧,基本都是湖沼,只有少量稻田。银川老辈人俗称的七十二连湖,就是指银川西湖到永宁李俊、青铜峡邵岗堡的几十个湖泊,包括西门桥西南的鱼湖、保伏桥西南的宝湖,五里台的几个湖,望远镇西部丰盈堡的20多个湖,以及永宁县增岗、杨显、李俊西面的20多个湖。也就是说,到了清代,千金大陂已经在宁夏府城之西断开。

(据宁夏文史研究馆微信公众号)



石嘴山先后设五县 平罗县沿革至今(下)

据《宁夏府志》记载,这次大地震“地多斥裂,宽数尺或盈丈,黑水涌溢,其气皆热”,宁夏府城和平罗、宝丰、新渠等县城都被摧毁殆尽。后来,查朗阿赶到宁夏,查看之后,奏报朝廷说:这次地震“竟如簸箕上下两簸。瞬息之间,阖城庙宇、衙署、兵民房屋,倒塌无存。男妇人口奔跑不及,被压大半。城垣四面塌累仅存基础”,“平罗、新渠、宝丰三县,从洪广营,平羌堡,阖城房屋亦倒塌无存”。

《清代地震档案史料》载:震中一带地面下陷,使新渠和宝丰两县大部分地区的地面比黄河水面还低2米左右。地震过后,河水汹涌而入,南自新渠县,北至石嘴山,东连黄河,西达贺兰山,周围一二百里的地方变成一片冰洋大海。震灾的幸存者淹死、冻死、饿死的不计其数。乾隆四年三月(1739年4月),朝廷依钦差兵部右侍郎班第请奏“宁夏地震,所属新渠、宝丰率成冰海,不能建城筑堡,仍复旧规:请将二县裁决;所有户口,从前原系召集宁夏、朔朔等乡民人,令其仍回原籍;有愿留佣工者,以工代赈,俟春融冻解,勘民可耕之地,设法安插,通渠概种”(《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

惠农县

惠农县因清代开凿惠农渠得名,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建县时定名“惠农县”,民国三十年(1941年)四月一日,宁夏省政府将平罗县北部8个乡划出设县,县治宝丰镇。辖境包括当时的上宝闸、下宝闸、南长渠、北长渠、里西河、外西河、通润、通惠、惠北、双渠、西永润、东永润、灵沙、渠阳、永屏、庙台、下省嵬、上省嵬、渠中、通丰、东永固、西永固池、西永固、西宝池、万宝池、尾闸、市口27堡和聚宝、万宝、宝马3屯以及王泉口沟以北的贺兰山区,建县时划分为8个乡47堡639甲。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宁夏省政府在县境黄渠桥设置“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惠农县为辖县之一。1949年9月26日,惠农县解放,县人民政府建立,将全县划为8区48乡。1954年10月15日,惠农县移至黄渠桥。1959年1月25日,惠农县移至石嘴山镇。1960年3月26日,惠农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与石嘴山市首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合并举行,宣布国务院关于设立石嘴山市和撤销惠农县的决定。1987年1月23日,国务院批准撤销石嘴山市郊区,恢复惠农县建制。2003年12月,石嘴山市行政区划调整,撤销惠农县和石嘴山区,设立惠农区。

陶乐县

陶乐县位于市境东南部的黄河东岸、鄂尔多斯台地西缘,南北长98公里,东西宽7.5公里,东北与内蒙古鄂托克旗、乌海市、鄂托克前旗相连,南以明长城为界与灵武市毗邻,西濒黄河与银川郊区、贺兰县、平罗县和惠农县隔河相望,土地总面积909平方公里。明、清时期,陶乐长期为内蒙古鄂尔多斯部牧地。蒙古语将县境和黄河两岸的滩地统称为“察汉托辉(护)”,意为“白色的湾子”。此后,人们将“察汉托辉(护)”又称为“托护(勒)滩”。再后来,又音转为“陶乐湖滩”。建县时又简化为“陶乐”做县名。河西农民陆续前往垦荒,逐渐形成沿河东岸的垦殖区,形成一定的人口规模。清末民初为平罗县东永惠堡辖。民国十三年(1924年),绥远省主席马福祥建

议设“沃野设治局”,派人到鄂旗大量开垦,并对以前租卖土地的农户进行行政管辖。这样,陶乐地区黄河东岸开垦面积达45平方公里。民国十七年(1928年)宁夏设省后,就今陶乐县境归属与绥远省发生争端。民国十八年(1929年)宁夏省在今县境置“宁夏省陶乐设治局”,治理河东新开垦土地,遭到绥远当局反对。绥远当局以陶乐湖滩与五堆子系鄂托克旗辖境,应属绥远省范围。民国十九年(1930年)八月,绥远省将该地改为“绥远省沃野设治局”,五堆子地段正式归绥远管辖。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绥远沦陷,宁夏当局即将县境纳入版图,置“陶乐设治局”,辖境南起横城,北至王元地,长150公里;东接鄂托克,西濒黄河,宽20公里,治所设今高仁镇。民国三十年(1941年)七月十七日,陶乐设治局升为县,辖2乡13个行政村。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陶乐为宁夏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县之一。2003年12月石嘴山市行政区划调整,撤销陶乐县,将红崖子乡、高仁乡和马头沟镇划归平罗县,将月牙湖乡划归银川市兴庆区。

(据石嘴山档案微信公众号)

银川市解放初期党组织建设(上)

1949年10月10日,中共银川市委成立。从此,银川市委担负起领导全市人民建设新生活的重任。

面临的形势

解放后,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重大变化,党的任务由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变为贯彻实施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管理国家,改造社会,建设新生活。在新的形势下,要完成新的任务,刚刚成立的银川市委面临着重重困难和考验:在军事上,国民党政权虽然被摧毁,但潜伏了大批特务,他们与匪徒和各种反革命势力相互勾结,蠢蠢欲动,企图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权。在经济上,一方面,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长期统治,不断搜刮民财,百姓的生活十分窘迫;另一方面,战争和灾荒,使本来就十分落后的银川经济更是雪上加霜,一些手工作坊濒临倒闭或破产。在商业方面,物资奇缺,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市场混乱。当时,遏制通货膨胀,恢复生产,维护社会治安稳定成为市委和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复杂形势和种种困难,市委迎难而上,接受挑战,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发展新党员

银川是新解放区,党的组织极其薄弱。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解放银川时,只发现了一位中共地下党员。市委成立后,市、区两级机关共有党员82人。他们主要是从革命老区(三边地区)接管的干部和解放宁夏时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留下来的干部。因此,建党工作是市委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1949年11月20日,宁夏省委发出《关于建党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市县在肃清匪特、民主建政、征粮及冬季生产各项运动中,对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加强教育,发展为党员。市委根据省委部署,召开专题会议。会议提出要采取积极而审慎的态度发展党员,贯彻省委关于“有准备地公开党,有计划、有步骤地主要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的方针。会议还决定先在市和区两级机关和市民中发展党员。12月初,市委召开各区委书记及区委委员联席会议,研究在全市发展新党员、扩大党组织的工作计划。提出新党员发展的主要对象是城市贫民、手工业者、工人等“苦

力者”和公司的下级职员、青年学生中的积极分子,以及留用人员中的思想进步、工作热情、历史清白者。发展新党员的方法是,配合当时的中心工作,在发动群众与组织群众的基础上,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发展为新党员。计划第一期建党的时间从1949年12月初至1950年3月底,分前后两个阶段进行,前阶段为两个月,发展新党员32名,后阶段两个月,发展新党员47名,两个阶段共发展党员79名,并于3月底建立起三分之二的乡党支部。

银川刚解放不久,党组织在群众中没有公开,多数群众对党组织认识不足。当时,发展新党员有一定的困难。开始阶段,党组织有意培养积极分子,找本人谈话时都被拒绝。后经了解,他们的主要顾虑:一是家庭生活困难,怕加入党组织要脱离去县工作;二是担心党的纪律太严,约束太紧;三是怕交党费。针对这种情况,市委组织部于1950年1月22日召开区委书记会议,总结前一阶段工作,研究如何做好发

展党员工作。当时,比较有效的工作方法是与积极分子交朋友。由老党员主动与其建立关系,经过多次谈话,反复向发展对象进行党的性质、任务、纲领等方面的教育,并讲明党费是根据个人的经济情况自觉交纳,在动员和耐心细致的宣传工作中,到后一个阶段发展党员就顺利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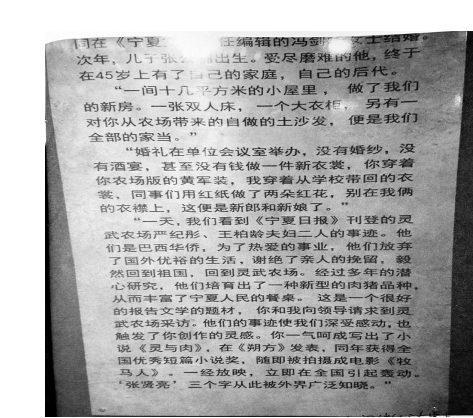
经过4个月的建党工作,全市共发展新党员54名,达到原计划的68%,加上老党员共计136名;共建立10个党支部,24个党小组。这10个党支部的分布是:市(乡)党支部3个,市、区两级机关党支部7个。机关支部有:市委机关支部1个,公安局支部1个,市政府、法院、税务局联合支部1个,4个区各建支部1个。1950年5月,宁夏省委决定将银川电厂、机器厂、宁夏师范、宁夏中学和明正女中等单位的党务工作,归属银川市委领导。于是,又增加了学校党支部1个,增加党员3名,全市党员共计139名。

(银川党史网)

移民岁月

第九十六期

电视剧《灵与肉》的原型来源于宁夏农垦(一)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当时还是宁夏《朔方》杂志社编辑的作家张贤亮和夫人冯剑华来到灵武农场,找到了《宁夏日报》《工人日报》和《光明日报》等新闻媒体报道中的严纪彤、王柏玲夫妇,对严纪彤、王柏玲夫妇进行采访并促膝长谈,详细记录严纪彤、王柏玲夫妇在灵武农场27年的坎坷与艰辛、拼搏与辉煌的人生道路和心路历程。

回去后,张贤亮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加班加点,将严纪彤、王柏玲夫妇感人的事迹和心路历程通过艺术加工和提炼,全部倾注在笔端,创作出蜚声全国的小说《灵与肉》。后来小说《灵与肉》经著名导演谢晋改编成电影《牧马人》,故事进入大众视野,受到广泛关注。

2016年,经宁夏电影集团公司和中央电视台联合改编拍摄的电视连续剧《灵与肉》在中央电视台和各省市自治区地方电视台多次转播。

经过近40年时间,不论根据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电影还是改编的电视剧,整整影响着两代人的感情。它的影响力在中国大地上经久不衰,它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响彻大江南北,人人皆知。

严纪彤,浙江省吴兴县人,1929年8月生。20世纪20年代,严纪彤的父亲严庆杰毕业于济南会计专科学校,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谋得会计一职,严纪彤出生后不久便和母亲、哥哥随父亲来到杭州生活。

1937年8月14日,抗日战争刚刚爆发1月,日本飞机轰炸杭州,严纪彤全家开始了逃难生涯,躲藏在浙江永康方岩山区,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他们风餐露宿、背井离乡,严纪彤因此辍学,和1岁多的妹妹感染上了麻疹,妹妹不幸夭折,严纪彤

扎根宁夏六十载 桃李满园不负韶华——记移民教师刘世俊(五)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搬入新楼后,刘世俊和恋人郭雪六喜结良缘。新婚的喜悦和“低标准”困难时期同时到来,刘世俊两口子和学校全体师生一起,为了填饱肚子打过树叶、挖过野菜,在饱尝忍饥挨饿的过程中坚持上好每一堂课,他们坚守着并倾尽全力把书教好。这期间不少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让他感悟到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来时路。

刘世俊:“低标准”时期特别困难,但还是有很多事让人难忘。记忆最深刻的有两件事:一件是大家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当时新盖了拐角楼和几栋教学楼,也算是宁夏大学在一张白纸上画出的第一组图画。困难时期每月供应只有21斤粮,老师们吃不饱,有的学生搬把椅子放到讲台上请我们坐着讲课。当时师生自觉地投身到整治校园的义务劳动中,每天下课后都去劳动,有一名叫杨明德的老先生,年龄比我父亲还长10岁,是北京一名有影响的教育家,也是自愿报名支援边疆建设的,他给学生们讲先秦文学,既有学问又待人和气,知识功底用来授课可说是游刃有余。“低标准”时期,他看到很多人都饿得浮肿,经常会叮嘱我们要注意劳逸结合,来日方长。杨老先生年事已高,很多劳动无法参加,他就用从北京带来的一个“水余儿”给大家烧开水,有时候大家不愿意麻烦老先生就喝凉水,老先生还很生气地说:别的东西我拿不出来,开水还来得及。有一次,上级部门关心知识分子,给每人供应两瓶果酱罐头,大家都舍不得一下子吃光,想细水长流,可那天杨老先生颤颤巍巍地推开我的门,要把两罐椰子酱罐头送给我,还说“这两个罐头我替我吃了”,我说“那哪行呀”,我坚决不收,因为这是大家天天盼着的东西。老先生平静地解释,“我是回民,在饮食上十分严格,没有标明清真食品不能破例,你就尊重我这个习惯,请二位代劳吧。”面对这样的托辞,我的眼睛湿

幸免于难。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他们一家随父亲回到杭州。严纪彤回到中学继续开始读书。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浙江国民政府解散,严纪彤的父亲也失业在家。为了生存,父亲靠打零工挣钱度日。那年,严纪彤高中毕业,考取了南京的中央大学畜牧兽医专业。解放后,大学里的院系相继成立为独立院校,他所在的院系独立为南京农学院。1953年9月,大学毕业的严纪彤被分配到宁夏灵武农场。

王柏玲,安徽省全椒县人,1931年7月生。她的父亲王南原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留学德国6年,获航天测量博士学位,抗战前夕回国从事专业工作,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航天测量专家之一。王柏玲的伯父王东原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大学,后投笔从戎考入保定军校,出师北伐。抗日战争时期,率七十三军参加淞沪战役,1938年升任三十四军团长参加武汉会战。抗战胜利后出任过国民政府湖北、湖南省政府主席。

解放后,王柏玲的父亲受中央密派,辗转香港赴台湾做伯父王东原的统战工作,后因抗美援朝爆发,她的父亲王南原只身一人前往巴西定居。退休后定居美国加州,著书立说。王东原文武双全,各项事业都出类拔萃,为国立功建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虽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王柏玲屡遭牵连,有着交代不清的社会关系,但伯父王东原一直是王柏玲心目中的偶像,对王柏玲有着深刻影响。1951年,王柏玲考入南京农学院畜牧兽医系,1955年7月毕业。(崔殿龙 祖宁平 撰稿)

扎根宁夏六十载 桃李满园不负韶华——记移民教师刘世俊(五)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润了,老先生的行动增强了我和大家共渡难关的信心。

第二件事有关宁夏大学的生死存亡。当时国家处在极度困难时期,一些机构要关、停、并、转。要不要继续把宁夏大学办下去是上级部门的两难选择,这时自治区党委建议先征求一下学校的意见。在学校层级的会上,有人主张给政府减轻负担,暂时停办宁夏大学,也有人提出要克服暂时困难,坚持把学校办下去。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最后又扩大了征求意见再开一次会议,刘世俊参加了第二次会议。当时会议在二楼会议室召开,老师们上二楼都困难,腿像灌了铅似的沉重,很多人脸肿胀的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但一听说暂时停办就不同意,刘世俊从这些眯成一条缝的眼睛里看到大家对新办大学的难以割舍和不离不弃,本来大家说话已经有气无力,但发言时大家又声音洪亮地表达出对自己劳动成果的不舍。

特别是这批撙节办教师,是为追求理想来到宁夏的,大家提出困难一定是暂时的,要咬紧牙关坚持下去,相信一定能战胜眼前的困难挺过去。大家还提出很多建议,怎样节省开支、怎样压缩规模、怎样劳逸结合等,最后形成一个旗帜鲜明的结论:给区委写报告表明师生们有信心渡过眼前的困难,宁夏大学一定要坚持继续办下去。

刘世俊:自治区党委随后发了关于次年招生计划的批复,实际上就是用招生计划的形式告诉大家要继续接着干。所以我说这是一次对宁夏大学生死存亡的会议,也是一次我终生难忘的会议。现在有很多人说宁夏大学跻身211系列是得到了国家的照顾,我认为这只说对了一半,有国家的照顾不假,但还有着创业初期那么多追求理想、敢于面对困难、勇于团结一心、全力拼搏奋进的教职员工的不懈努力和辛勤付出。(商银生 整理)